

# 从弥足珍贵的互助同盟到 代价深痛的全面对抗

——关于冷战时代中苏关系演变路径与教训的再思考

于洪君

**【内容提要】**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与苏联因志同道合而结成战略性同盟。苏联为新中国经济文化建设提供了多方面支持和帮助，中国一度出现“以苏为师”现象，苏联模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斯大林逝世后，中苏两党出现分歧，60年代后发展为意识形态论战。虽然双方为缓和关系做出过努力，国际上友好政党也曾居中劝和，最终于事无补。到60年代中后期两国关系发展为全面对抗，双方均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世界力量对比和国际战略格局也因此出现巨大变化。由于历史积怨与现实冲突相互交织，互信缺失叠加战略误判，双方边界谈判陷入僵局，国家关系正常化谈判难有起色。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后重新评估国际形势与外部环境，中苏关系改善的机会渐趋成熟。80年代中期苏联内外政策全面调整，但“三大障碍”一时难以解决。直到苏联风雨飘摇之际，中苏两国才在“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八字方针指导下，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

**【关键词】**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意识形态大论战 中苏边境冲突  
中苏关系正常化

**【作者简介】** 于洪君，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国拥有七千多公里共同边界，互为最大邻国。双方的历史联系千头万绪，利害交织经纬万端。中国革命战争年代，两国共产党相互同情，彼此支持，虽然不无芥蒂，但最终形成志同道合的特殊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对外关系领域“一边倒”，与苏联结成战略同盟，双方在国际事务中彼此配合与协调，为维护

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而共同斗争，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进程，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后来，中苏双方发生深刻分歧，两党关系迅速恶化，国家关系完全破裂，战略同盟变成全面对抗。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风雨飘摇之际，两国才最终实现关系正常化。审视中苏两国由结盟到对抗的历史发展，既有沉痛教训，也有诸多启示。

## 一 中苏两党志同道合为两国结盟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中国一成立，苏联即宣布承认，两国随即建交，东欧地区各社会主义国家迅速跟进。曾在苏联工作多年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成为首任驻苏大使，同时也是中共驻联共（布）代表。毛泽东以亲笔信方式向苏方介绍了王稼祥的双重身份。

1950年初，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两国战略同盟关系正式确立。时值世界社会主义高歌猛进、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东西方冷战开启不久。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结成同盟，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震动。实际上，这种国家同盟关系，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即已酝酿成熟。

1949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宣告，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要在国际舞台上联合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sup>①</sup>。解放战争开始后不久，毛泽东就作出了访问苏联的决定，以便就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与苏联领导人进行沟通，协调政策和立场。由于当时条件尚不成熟，还有其他一些复杂因素，已经启动的这次访问未能成行。

由于毛泽东访苏未能实现，而中苏两党亟需对许多重大问题进行沟通，1949年1月，苏联领导人派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华，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进行了长达七天的秘密会谈。双方就如何建立新中国政权，如何发展未来的中苏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甚至连新中国驻苏大使人选，也是这个时候确定的。

1949年夏，建立新政权的任务已提上日程。中国共产党派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秘密访苏，谋划中苏关系的未来框架和战略合作构想。通过此访，中共向苏方通报了筹组中央人民政府的基本考虑，明确表示希望苏联率先承认新中国，派

<sup>①</sup>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有经验的同志来中国帮助开展人民团体工作，派专家来华帮助开展经济建设，派教授到中国各地讲学，接收中国代表团到苏联参观访问，接受大学生到苏联学习等一系列非常具体和明确的要求。

苏方当时几乎全部满足了中方要求。经济上，同意为新中国提供 3 亿美元贷款，派大批专家到中国工作；在北京建立培养行政和经济管理干部的大学，在大连援建海军学校；帮助新中国组建空军，向中方出售战斗机和轰炸机；援建由北平经蒙古通往苏联的铁路等。政治上，承认 1945 年的中苏条约不平等；承诺对日缔约后即考虑从旅顺撤军；在新疆问题上支持中共，承诺不支持新疆独立也不在那里谋求特权。

刘少奇此访，加大了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力度，为新中国成立后双方走向战略结盟奠定了坚实基础。信任与合作成为中苏两党关系的主旋律。因此，中国全境尚未解放时，苏联专家就已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东北，帮助中共在解放区开展经济文化和社会工作<sup>①</sup>。

## 二 苏联的巨大成就导致新中国成立之初“以苏为师”

新中国成立后，对外交往的第一件大事是安排毛泽东主席尽快访苏。1949 年 12 月~1950 年 2 月，毛泽东对苏联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访问。此次访问的目的，一是参加斯大林诞辰 70 周年庆祝活动；二是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三是商签国家条约和协定；四是解决事关双方共同利益的具体问题。

毛泽东访苏期间，受到极高规格的接待和礼遇，但两国领导人因相互沟通不畅、彼此误解对方意图而产生摩擦。尽管如此，苏方最后还是接受了毛泽东建议，与新中国签署了为期 30 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签订了贷款及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总体看，斯大林对毛泽东是相当尊重的，苏联领导层对中国革命成功由衷敬佩。斯大林对当年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提出的错误政策和主张，表示了歉意。对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新国家，意愿是真诚的。斯大林当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样做符合苏联的总体国际战略构想，符合苏联在远东和整个亚太的地缘

---

<sup>①</sup> 1948 年，斯大林曾对即将来中国东北参与经济建设的专家组负责人表示：“为了援助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能吝惜力量和金钱。”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1 页。

战略利益。这样做当然也符合中国共产党建设新国家新政权新社会的根本利益。因此，中方当时宣布，中苏友好条约“不仅体现了中苏两国七万万人民的团结，而且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八万万人民的团结。它不仅鼓舞了殖民地的国家和被压迫的民族，同时也鼓舞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由于这个条约，欧亚大陆上的近七万万伟大的人民已经结成了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亲密同盟”<sup>①</sup>。

人们后来知道，毛泽东对当年出访苏联的印象并不愉快。1956年，毛泽东说出了他“一直藏在心里的话”。他说，“斯大林不愿意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毛泽东还说：“在谈判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中长铁路要中苏共同管理，旅顺口要做苏联的海军基地，在靠近苏联的新疆搞了什么股份公司。总之，新疆和东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sup>②</sup>毛泽东对苏联的这些看法，成为中苏关系后来纠葛丛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中苏确立战略同盟关系之初，双方的政治互信度是很高的，高层互动与往来十分频繁。1952年10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时，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到会祝贺。斯大林十分重视刘少奇一行，亲自打电话与刘少奇商讨访问日程，与中国代表团进行了两次长时间会谈，就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新宪法、组织中央政府等事提出一系列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这段时间，周恩来总理和负责经济工作的官员多次访苏，以落实苏联援建的经济项目。在地区和国际事务方面，双方在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中国的联合国代表权、缔结对日和约等重大问题上，注意协调立场，始终相互支持。特别是在支持中国抗美援朝、开展军队正规化建设方面，苏联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正是在苏联的帮助下，1952年，新中国有了第一个苏式武器改装师。据有关资料透露：“中苏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下开始建立军事战略与合作关系。苏联向中国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和专家，援助和出售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帮助中国研制

<sup>①</sup>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2、21页。

<sup>②</sup>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4页。

尖端武器等，对中国海军、空军的现代化建设，以及发展独立自主的国防工业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sup>①</sup>

苏联不但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全力支持新中国，而且还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开展思想建设，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譬如，斯大林本人不但积极鼓励毛泽东出版自己的文集，而且还亲自安排苏联著名哲学家尤金到中国从事文字处理工作。当毛泽东的《实践论》俄文稿寄到苏联后，斯大林指示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全文发表。随后指示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文，盛赞毛泽东此文“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毛泽东当时非常高兴，指示《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中文版《实践论》和《真理报》文章，然后由新华社全文广播。此后，苏联出版四卷本俄文版《毛泽东选集》，其中包含了中文版《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三卷的全部内容。

鉴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体制独特而稳固，经济文化建设成就举世公认，社会治理与民族关系井然有序，“以苏为师”，即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一时成为中国共产党秉政治国的核心理念。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军事工作等一切领域，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实行了与苏联大同小异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如此等等。新中国以苏为师的朴素意愿，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无可厚非。其实质是中国人想“建成像苏联一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过上像苏联人民一样富足的生活”<sup>②</sup>。

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使“学习苏联经验”之风从教育领域刮向全国。会议明确将“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作为新中国教育工作的指导方针<sup>③</sup>。中国高等院校50年代初开始教育改革，重点是按苏联模式进行院系专业调整。在此情况下，1950年4月联共（布）中央批准了关于派遣苏联教授和讲师到中国工作的决议草案。苏联专家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国<sup>④</sup>。

1952年3月，中国高教部发文，要求“大力翻译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

<sup>①</sup> 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外事办公室编：《为了和平与安全——新中国军事外交历史回眸》，第7页。

<sup>②</sup> 见戴秉国：《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年版，第30页。

<sup>③</sup> 转引自卫道治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页。

<sup>④</sup> 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第111、72页。

教学大纲和教材，并参照制订、编写我国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正是基于“以苏为师”理念，1950~1952年间，至少有5位苏联专家在中国教育部担任顾问<sup>①</sup>。至1952年6月，约有80名苏联专家在中国高校工作。至1953年，已有63所中国高等院校与苏联同行建立了直接联系<sup>②</sup>。自1952年起，新中国开始启动外派留学生工作。当年派出231人，其中220人去了苏联。1953年中国外派留学生675人，其中583人去了苏联。

### 三 苏联领导层调整初期双方继续保持友好交流与合作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逝世，苏联领导层和内外政策随即发生重大变化。在此前后，中苏两国政治关系仍然相当密切。1953年5月，刘少奇在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3周年大会上讲话，仍然强调“全面学习苏联”。苏联同样高度重视中苏两国战略同盟关系，任命与毛泽东私交甚深、已是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的尤金为驻华大使。

1953年12月，苏联一位副总理来华访问，毛泽东亲自向他透露了中共党内出现高饶反党集团一事。1954年2月，中共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饶问题时，刘少奇和周恩来专门召见了苏联大使，向他做了内部通报。双方的互信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954年9月，中方不太熟悉的赫鲁晓夫意外地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9月底，赫鲁晓夫率庞大代表团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国庆活动。在这次访问中，苏方承认斯大林曾对中国犯有大国主义错误，认为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可以作为处理一切国家关系的基础，同意将苏联海军使用的中国旅顺基地交给中国，同时将中苏共同经营的中长铁路和几个合营公司的苏方股份转给中方。此外，苏方同意为中国增加15个大型援建项目，扩大中苏之间原有合作协议规定的141个项目的设备供应范围，再向中方提供5.2亿卢布长期贷款，修建连接中苏边界的两条新铁路，增派专家来华工作，接收中国工人到苏联做工。

当时，赫鲁晓夫刚刚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为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以强化他在苏联的地位和权威，因而迫切需要来自中国的支持。在满足中国维护主权

<sup>①</sup> 有关苏联教育专家来华工作的数据，各方统计不尽一致，详见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第112~113页。

<sup>②</sup> 卫道治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第323页。



地位的合理诉求、扩大对华援助方面，他作出了明显超越斯大林时代的承诺，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援助计划和方案。苏共党内当时有人认为，苏联的战争创伤尚未治好，无力承受大规模对华援助。但赫鲁晓夫认为，他的北京之行不能仅限于发表政治宣言、声明和外交议定书，需要的是经济基础。他强调，“如果不帮助中国在未来的5年内实现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根本大计，那我们就将错过同中国建立和巩固友谊的历史时期”。出于这样的考虑，赫鲁晓夫访华时，把苏方运来参加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的80多件样机赠给了中国，另外还向中方赠送了可用于2万公顷耕地的农机设备。

双方对赫鲁晓夫访华的结果和此时的中苏关系，均表满意。因此，1954年12月26日毛泽东60岁寿辰时，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庆祝宴会，苏联党政军高级官员几乎全部出席。这一年，时逢中苏条约签订5周年，毛泽东亲自出席了苏联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在致词中高度赞扬“中苏两国的伟大的合作”，确信“这种合作还会进一步加强”<sup>①</sup>。周恩来在苏联驻华大使为此而举行的庆祝宴会上，也曾动情地说：“苏联政府和人民基于两国共同繁荣的愿望，给予了中国人民全面的、系统的、巨大的援助。这种援助使得中国人民有可能在短短的五年里不仅完成了经济恢复的工作，而且很快地进入了有计划的建设阶段，迅速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力量和国际力量，推动了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业的顺利前进。”他赞扬中苏“友好同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说“中国人民深切地感到中苏友谊的无尚珍贵”<sup>②</sup>。

对于中苏结盟时期这段历史，客观地说，苏联的支持和帮助是不可低估的。诚如戴秉国后来所说：“苏联对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给予了宝贵的援助，为新中国奠定初步的工业基础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苏联支持在联合国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支持中国收复台湾，对于新生的共和国具有重大政治意义。”<sup>③</sup>

1955年，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刘晓被任命为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赴任前，毛泽东嘱咐刘晓：“要认真研究苏联的外交政策，同苏联的政策进行配合和合作”，“还要观察苏联国内的政局变动，多和赫鲁晓夫接触”。周恩来总理也找刘晓谈话，就中苏关系问题向他“交了底”。周恩来说：“我们建国不久，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还很少，所以我们要向苏联学习，五年计划需要苏联的援助，何况

① 《人民日报》1955年2月15日。

②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09～110页。

③ 戴秉国：《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第30页。

美帝国主义还时时刻刻在威胁我们。所以，无论从内部或从外部来说都需要同苏联搞友好。驻苏使馆的工作要本着友好合作精神进行，要巩固中苏友谊，发展两国关系。”<sup>①</sup>

刘晓同王稼祥一样，也是以中国驻苏大使和中共驻苏共代表的双重身份抵达莫斯科的，抵苏后工作顺利。赫鲁晓夫会见刘晓时表示，苏共把中共看成是亲密的兄弟党，在对外政策上，苏联与中国“要互相帮助，互相配合”。

1955年，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出访波兰途经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出面会见。他赞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丰功伟绩，赞扬彭德怀本人是“军事天才”，同时一再表示，苏联可以考虑用大型远程轰炸机以及空对地、地对舰导弹等新式武器帮助中国，并且愿意考虑把中国和华沙条约结合起来。为了显示他对中国的信任，赫鲁晓夫透露，他将前往南斯拉夫修复苏南关系，并把他的讲话稿让彭德怀提前看了，意在显示他对中国没有保留<sup>②</sup>。

#### 四 对斯大林问题看法迥异导致中苏分歧不断加剧

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出现裂痕，两国战略同盟关系发生动摇，始于1956年。当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了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苏共二十大。中方高度重视，派党中央副主席朱德率团到会祝贺。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提出了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观点，并在会议闭幕的当天夜里，就斯大林个人迷信及其后果问题作了秘密报告，以相当尖锐的语言批判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并把斯大林所犯错误归结为个人性格问题。大会闭幕后第二天，苏共中央国际部向中共代表团作了通报。随后，苏方将报告复本发给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党代表团，另有一份送给中国大使刘晓<sup>③</sup>。赫鲁晓夫或许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2月28日亲自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解释了“秘密报告”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的报告深感震惊。虽然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但又认为，这是“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这么大的事情，

<sup>①</sup>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sup>②</sup> 同上，第13页。

<sup>③</sup> 同上，第14页。



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sup>①</sup>。1956年4月和12月，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两篇文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开始不点名地批评苏联共产党。

当时，中苏两党分歧并未公开，双方高层往来仍正常进行，但毛泽东非常明确对苏联来宾表示，斯大林功大于过，要全面评价。与此同时，他开始在党内批评建国初期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1956年秋，米高扬率团来华参加中共八大，为维护中苏关系大局，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公开讲话时对苏共二十大给予了充分肯定。但大会结束前毛泽东会见米高扬时，尖锐批评了苏联党的“坏习气、坏传统”。他表示，中方“将要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场合，讲明我们自己的观点和以高昂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这就是说，我们要发言，要讲话，还要写文章，或许还要骂人。”这番话表明，毛泽东已决定从理论上讨伐苏联共产党。

1956年10月，波兰和匈牙利发生政治动乱。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同苏共领导人举行六次会谈，并参加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商讨局势，确定对策，协调立场。当时，苏联与波匈两国的关系出现严重危机，苏方准备动用武力迫使波兰接受苏联关于波党领导层的人事安排。中国党坚决反对，认为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大国沙文主义；但匈牙利发生的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应采取不同的方针。刘少奇还表示，苏共在斯大林后期所犯的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错误使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这是波匈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中国党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必须建立在独立原则和平等原则基础上。在中方建议下，苏联政府于10月30日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过去在这方面犯了错误<sup>②</sup>。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予以响应，阐明了中国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主权和国际主义的一致性。

赫鲁晓夫部分地接受了中国党的批评建议。在当年年底举行的新年招待会上，他向中国大使表示：“我读了中国发表的文章，它写得好极了。我同意里面的每句话和每个字。”祝酒时，他还慷慨激昂地表示：“斯大林犯了严重错误，但他仍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

---

<sup>①</sup>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3~5页。

<sup>②</sup> 《人民日报》1956年11月1日。

1953~1956年间，中国在许多方面仍非常重视学习苏联经验。中方除翻译出版十三卷本《斯大林选集》外，还大量翻译出版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被当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读物，成为全体党员干部和高校学生的必读书。在教育领域，1953年7月，中国高教部发出新学年工作计划指导要点，要求继续全面学习苏联教学制度、教学方法及教学经验。在此前后，许多苏联教科书、教学大纲和教育理论著述，被译成中文。1954年，高教部委托26所高校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制定了统一的教学计划，共有620门课程采用苏联教材。1954~1956年间，中国派出6012人到国外留学，其中5392人去了苏联。到1956年初，已有大约100名教员被选送到苏联。1956年，中科院首批派出129人作为研究生赴苏学习<sup>①</sup>。

## 五 双方为弥合裂痕做了最大努力但事倍而功半

1957年初，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赫鲁晓夫亲率大批高官到机场迎接，但双方的这次接触并不愉快。会谈中，周恩来陈述中方对斯大林问题的立场，对苏联的一些做法提出了批评。赫鲁晓夫表示，双方对斯大林遗产问题看法一致，这在党的关系上不会发生矛盾。他甚至说，苏共要配合中共的政策，以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双方就当时的国际形势发表了联合声明，但在一团和气的表象之下，苏联对中方的一些立场和主张并不认同。特别是周恩来关于兄弟党相互关系的讲话，引起苏方某些人不满。他们认为这是中方在给苏联“上大课”，有人甚至打算中途退场。此外，周恩来当面责问赫鲁晓夫等人，你们与斯大林共事多年，难道对助长斯大林的错误没有责任？苏方对此也很不愉快。

周恩来在莫斯科跟苏联人“抬杠子”，是有所准备的，也是奉命行事的。周恩来在苏期间，毛泽东与他通电话，告诉他：“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方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事后，毛泽东透露说：“中苏之间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扯皮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毛泽东还说：“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目前只要大体过

<sup>①</sup> 1962年，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生仅74人，但仍占当年出国留学总数的59%。1956年中国派遣赴苏留学生最多，为2085人，占当年派出人数的86%。

得去，可以求同存异”。

这次高层交往表明，中苏两党分歧已相当深刻，对立情绪在急剧升温。但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利益和出于反帝斗争实际需要，毛泽东当时仍对苏联驻华大使表示，中国将为不断巩固和发展双方的团结和友好合作而努力。周恩来也表示，中国和苏联的友好团结是社会主义国家伟大团结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sup>①</sup>。

这年夏季，苏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发生重大变故。赫鲁晓夫以“反党集团”为名，清洗了党内反对派势力，随后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专程来华通报情况。出于维护团结的考虑，毛泽东对此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党还公开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支持电，在政治上给了赫鲁晓夫很大帮助<sup>②</sup>。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同时参加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sup>③</sup>，受到特殊礼遇<sup>④</sup>。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苏联的对外政策，明确表示反对向帝国主义退让。但毛泽东在讲话中，同时还赞扬了苏联的历史成就，强调中国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共命运、同呼吸”，强调“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义务”。两党领导人会谈时，毛泽东指出，国际共运中实际存在的不是什么兄弟党关系，而是“父子党”、“猫鼠党”关系，赫鲁晓夫不得不表示同意。

此次莫斯科会议形成了《莫斯科宣言》与《和平宣言》两份文件。在文件磋商过程中，中苏分歧进一步扩大。中方认为，苏共企图把“修正主义货色”强加于社会主义阵营，苏方对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的提法不以为然。两党围绕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为了明确表达中方对许多问题的不同看法，中方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不过，为了顾全大局，毛泽东高度赞扬了苏联的科技成就和综合国力，并且主动劝说一些党的领导人接受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在同赫鲁晓夫交谈时，毛泽东推心置腹地谈到了中国党的接班人问

①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88~189、195页。

② 详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26页。

③ 这次会议当时称64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实际上与会的是68个国家的党，其中有4个党由于自身环境问题而没有公开。

④ 徐晓天、李春隆、徐振泽：《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上册），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5页。

题，坦率地评论了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人的长处与弱点，意在显示中苏两党历史形成的同志式信任关系<sup>①</sup>。

由于两党间的分歧日益加剧并且渐趋明朗，中苏双方的国家关系这时也出现了问题。围绕着台湾海峡局势、中国是否应当制造原子弹、中苏是否应当共同建立长波电台和成立共同舰队等重大问题，双方发生了激烈冲突。毛泽东认为，苏联想干涉中国内政，“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sup>②</sup>。1958年7月，他同苏联大使尤金谈话时，尖锐地批评了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主义。他抨击斯大林把“中国人看作是第二个铁托”，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他还气愤地表示：“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毛泽东无所顾忌，他请尤金大使把他的话告诉赫鲁晓夫，作好了与苏联公开摊牌的准备。但是，为了给两国关系留下改善、转圜、调整并正常发展的空间，毛泽东同时表示，中苏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学生给教授提意见，并不是要把教授赶走，“教授还是好教授”。

苏联方面意识到了中苏关系恶化的严重性。当年7月底8月初，赫鲁晓夫秘密访华，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达成某些谅解，并于8月4日发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公报宣布：双方决定继续全力发展两国间的全面合作，对所有讨论的问题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而实际上。此次访问根本没有消除彼此间的不信任情绪，双方在分裂和对立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一步。

1959年9月底，赫鲁晓夫为参加中国国庆，第三次应邀来华访问，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双方的这次“亲切会见”和“友好会谈”，实际上变成了一场争吵和冲突。赫鲁晓夫攻击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说中国“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指责中国在金门、马祖打了场“有始无终”的仗，甚至断言中国搞坏了与印度的关系。10月4日，赫鲁晓夫提前回国。双方没有发表任何宣言、声明或公报。回到苏联后，赫鲁晓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大骂中国“像好斗的公鸡那样热衷于战争”。中苏关系因此受到了更加严重的损害。12月21日，中方以纪念斯大林诞辰80周年为契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高度评价斯大林，激烈谴责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加大了间接批评苏共的力度。

当时，赫鲁晓夫正在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改善苏美关系。特别是1959年访美

<sup>①</sup> 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15~623、625~644页。

<sup>②</sup>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85页。

之后，他到处宣扬美苏合作的所谓戴维营精神，宣扬全面彻底裁军和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理论。为讨好美国，苏联废止了关于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资料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中国和印度发生边界纠纷后，苏联致信中方，公开偏袒印度。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更加反感、鄙视和愤怒，但依然比较克制。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向他表示，中国认为赫鲁晓夫访美还是有好处的，至于不久前的中苏会谈，毛泽东表示，双方虽然在具体问题上有一致的地方，但这是十个指头中间一个指头的问题。

此时，中方仍在强调中苏两国两党要团结一致，对外是这个调子，对内也是这个精神。1960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赫鲁晓夫这个人也并非全都是错的，他还要社会主义阵营，仍然支持中国的建设，虽然他的未来发展具有多种可能，但“应该相信他的这种错误到头来是会被纠正的”。毛泽东特别指出，赫鲁晓夫讲话不大注意，对此“不要太认真”<sup>①</sup>。要“再看几年”。对“苏共是个好党”这个大前提，“还是应该肯定”。“同苏联要团结，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要团结”。

## 六 空前绝后的意识形态大论战彻底撕裂两国关系

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国领导人的互信度与日俱衰，毛泽东尤其看不起粗鲁任性的赫鲁晓夫。进入60年代，双方前嫌新怨相互交织，争吵代替了对话，敌视毁灭了友谊，合作彻底成为过去。

1960年4月，中方利用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机，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了苏共的一系列理论主张。6月，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周恩来在招待会上提出：“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中苏两党思想分歧向公开争论方向急速演进。

6月上旬，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率团与会，恪守“坚持团结，坚持原则，摸清情况，后发制人，据理辩论，留有余地”的基本方针，与苏共代表团唇枪舌战。赫鲁晓夫毫不相让，且出言不逊，声称中国“要发动战争”，是“纯粹的民族主义”，指责中方

---

<sup>①</sup> 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229~233页。



关于列宁主义的文章理论上是错误的，组织上也是错误的。他还挖苦中国党：“你们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抬到北京去好了。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会谈后，苏方代表团向与会的各党散发通知书，东欧各国党对中国党群起而攻之。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走向公开分裂。

7月，苏方撕毁了同中国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和257个科技合同，并于9月初之前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同时终止派遣应该来华的900多名专家。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了全部图纸计划和资料，同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国250多个建设项目陷于停顿半停顿状态<sup>①</sup>。

9月，经越南领导人居中劝和，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谈，专门讨论相互关系。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劝告苏共领导改变立场，回到兄弟党、兄弟国家相互关系准则上来，但会谈无果告终。不久后，中共派出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试图同苏共领导人继续交换意见，但苏共利用这个机会召开了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并把会议变成了围攻中国党大会。这时，双方争斗的实质不再是个别理论观点，而是压服与反压服、围剿与反围剿问题。即便在这种形势下，中方仍顾全大局，维护国际共运团结，在会议最后文件上签了字。

1961年新年过后，中共中央作出决议，强调“现代修正主义仍然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这时，苏联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严重恶化，中方旗帜鲜明地站在阿方一边，中苏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当年10月，中共派周恩来率团出席苏共二十二大，以维持双方的高层接触，但会议期间双方再度争吵，周恩来提前回国。

1962年1月底，毛泽东作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已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但修正主义的统治不会长久”的重大判断。是年春季，苏方在中国新疆地区策动6万多中国公民外逃，导致伊宁地区发生数千人参与的武装暴乱。苏联在恶化两国关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63年2月，苏共致信中方，要求停止论战。赫鲁晓夫本人也提出了类似建

---

<sup>①</sup> 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组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0）》，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22页。



议，但遭到拒绝。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表示：“这场论战是不可怕的，天塌不下来，草木照样生长，女人照样生孩子，鱼儿照样在水里游。”实际上，苏方也未采取任何步骤缓和中苏关系，反而变本加厉，继续从事国际反华宣传活动。3月13日，苏共致信中方，阐述苏方对一些国际问题的立场和观点，进一步扩大“战火”。三个月后，中方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作为回应。又过三个月，苏共发表声明，指责中方对莫斯科会议宣言和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苏共中央全会作出决议，“断然拒绝”中方“没有根据的诽谤性攻击”。

为消除隔阂，弥合分歧，1963年7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再次会谈，讨论两党分歧问题，但无果而终。会谈期间，苏方发表公开信，指名攻击中共。中方作为回应，公开转发此信，同时重新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中共中央发言人声明。此后，两党论战急剧升级，中方成立写作班子，连续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等九篇文章，痛批苏联“分裂主义”“修正主义”和“假共产主义”。苏方也发表了大量攻击诋毁中国内外政策的言论，指责中方在国际上充当“右翼的角色”，“破坏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拆散社会主义世界大家庭”，等等。

由于双方分歧日益扩大，矛盾日益加深，历史遗留的中苏边界问题也被提上日程。1964年2月，两国代表团在北京举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边界谈判。双方围绕沙皇俄国强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等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7月，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明确提出要同苏联“算领土帐”。苏联领导层出于多种考虑，没有接受本国代表团关于搁置争议岛屿，就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区段签署文件的建议。8月，两国边界谈判中断。

1964年10月，苏联领导层生变，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成为苏共新领袖。中方停止了对苏共的批判。11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意在弄清苏联对外战略和对华政策新动向。苏方表示，苏联党过去和现在都是集体领导，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上，苏共中央是一致的，完全没有分歧。更令中国人气愤的是，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在招待会上竟对中国代表团口出狂言，声称苏联已经赶走赫鲁晓夫，你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毛泽东，这样中苏之间的事情就好办了。周恩来得知后当场罢宴，以示抗议。苏方后来就此作了道歉，但恶劣影响无法挽回。中苏改善关系的重大机遇，由于苏共新领导缺乏远见而失之交臂。

1965年2月1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访问越南回国时顺访中国，试图说服中方停止论战。毛泽东对他表示，公开论战要进行一万年，减少一千年是“最大的让步”。周恩来在与柯西多会谈时，就发展两国关系的具体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5月中旬，他会见苏联新任驻华大使，重申了相关意见和建议，强调“我们两国之间可以做的事情还不少。因为两国人民是愿意发展友好关系的”<sup>①</sup>。此时，罗马尼亚和拉美地区一些党都建议中苏停止论战，但双方不为所动，论战持续升级。当年3月，中国在苏留学生参与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示威游行，遭到镇压。中方反应强烈，认为苏联新领导集团已经变为“新沙皇”。

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向中方发出与会邀请，被中方断然拒绝。中苏两党关系从此中断。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彻底绝交。

## 七 全面对抗将中苏关系引向军事冲突和准战时轨道

1966年是中国以“反修防变”为目的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初始之年，国家内外政策深受左的思想影响。苏联驻中国大使馆附近的街道，被更名为“反修路”。“反帝反修”成为中国开展“国际斗争”的两大任务和目标，中苏关系前景愈加暗淡。虽然苏共领导人在二十三大上宣布，苏方愿意“同中共领导一起重新研究现有分歧，以便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克服这种分歧的途径”，但争吵和论战已导致相互仇视和对抗。1967年1月25日，部分中国留苏学生在莫斯科红场向列宁和斯大林陵墓献花，高呼“打倒新沙皇”等口号，遭到驱赶和镇压，数十人受伤。中国对此作出强烈反应<sup>②</sup>。10月，苏方决定中国留学生全体休学，人文交流从此也彻底中断。

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遏止了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中方断定苏联已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联合东欧地区与苏联积怨甚深的阿尔巴尼亚，在国际上高举反修斗争大旗。1969年，中苏两国军队发生多起边境冲突，双方的政治对抗发展到战争边缘。美国有报纸发出消息称，苏联欲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中方对此高度警觉，以政府声明方式作出了不惜一战的强硬表态。

<sup>①</sup>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6页。

<sup>②</sup> 转引自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0页。

此后，中国把苏联视为最大安全威胁，“时刻准备打仗”，一度成为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1969年甚至出台带有战争动员性质的“一号命令”。苏方也不示弱，声称中方对苏怀有“领土要求”，并且投入数千亿卢布，部署上百万大军，强化中苏、中蒙边境军事设施。

后来许多信息表明，对于中苏开战的危险性，苏方没有估计那么严重，也没有进行真正的战争动员。中国驻苏使馆外交官们也发现，苏联的情况和他们在国内的感受完全不同，根本看不出要和中国打仗的迹象<sup>①</sup>。第一次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苏联领导人就通过政府专线要求与中国总理或外长通电话，后来苏联总理柯西金试图与毛泽东或周恩来通话，但都被“反修”意识极强的中方话务员拒绝<sup>②</sup>。事后中方认为，双方通过外交渠道进行沟通为好。此时双方都有通过谈判解决冲突的意愿和准备。

9月11日，已经不想再打专线电话的柯西金，主动提议访越回国时来北京会见中国总理周恩来，得到积极回应。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举行会晤。双方同意：长期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此之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sup>③</sup>。双方在会谈中还决定恢复互派大使，恢复双边贸易。一周后，周恩来致信柯西金，敦促他来信确认上述决定和相关措施。10月20日，第二次中苏两国副外长级边界谈判正式开始。毛泽东主席在会见苏联代表团负责人时表示：“我们应当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有耐心。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sup>④</sup>

双方为缓和边境地区紧张局势作了共同努力，两国间一触即发的大战风险得以规避。当年12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一方面重申，苏联“同中国共产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和国际主义团结的方针是不可动摇的”，另一方面又表示，“必须坚决揭露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反列宁主义观点和大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方针”<sup>⑤</sup>。

进入70年代后，中国已明显摆脱文革初期极左思潮干扰，对外关系纠偏有所成就。1970年下半年，中苏互派大使，事实上的代办级外交关系恢复到大使级，但两国关系仍无法根本改善。苏方反复提出希望举行高级会晤，中方都“不

① 戴秉国：《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第27页

② 详见周晓沛：《别样风雨情缘》第二章，五洲传播出版社2019年版；另见戴秉国：《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第30页。

③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63~464页。

④ 详见周晓沛：《别样风雨情缘》第二章。

⑤ 于沛、陈之骅：《苏联共产党九十三年》，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38页。

作正面回应”<sup>①</sup>，两国边界谈判也完全停了下来。柯西金建议再度会晤周恩来，推动谈判，中方未予同意<sup>②</sup>。

苏联为恢复国际共运团结，倡导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中方拒绝参加，并斥之为分裂主义“黑会”。苏联提出的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也受到中国强烈批评。虽然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苏联支持中国，在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战争问题上，中苏双方还维持着事务性合作，但对苏联总体外交政策，中方一直大张伐挈。两国的贸易往来和人文交流几乎为零。

此时，中国认定苏联是最富侵略性的超级大国和最具危险性的战争策源地，作出了联合美欧日本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决策。1972年，尼克松应毛泽东邀请成功访华，美苏中大三角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世界上形成了“中美联手共同抗苏”的战略格局。1974年，毛泽东提出以反对美苏争霸世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为核心内容的“三个世界”理论，但联合一切力量重点对付苏联的政策没有明显改变。当然，出于策略考虑和宣传需要，双方都曾多次表示，要争取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1975年，中国总理周恩来表示，“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原则争论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历来认为，这种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

## 八 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虽艰难曲折但小有所获

1976年9月，毛泽东主席逝世，中国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苏共中央发来唁电，实际上是探测恢复两党关系的可能性，中方拒绝了来电。中苏关系继续处于冰封状态。

70年代末，中国开始大幅度调整内外政策。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开始考虑如何通过改革消除苏联模式的消极影响问题，同时积极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他提议中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型睦邻关系，呼吁苏方采取实际行动。与此相适应，中方对苏联口诛笔伐的势头明显减弱。1979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即将期满。中方决定条约期满后不予延长。在将此决定告知苏方时，中方表示，希望中苏两大国能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同时建议两国就此进行谈判，得到苏方响应。

<sup>①</sup> 戴秉国：《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第32页。

<sup>②</sup> 详见周晓沛：《别样风雨情缘》第二章。

1979年9~11月底,第一轮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在莫斯科举行。谈判未有任何结果,但双方恢复了教育交流。遗憾的是,在此关键时刻,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尔后出兵阿富汗,对中国国家安全形成威胁。中国声讨苏联霸权主义、与美国联手遏制苏联扩张的力度重新加大。1980年1月,中方宣布,中苏谈判在此种情况下不宜进行。已经提上日程的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被重新搁置起来。

1982年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一方面仍然攻击中国,另一方面明确承认中国为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且还建议开展磋商,采取双方都可接受的措施改善中苏关系。邓小平捕捉到这一信息后,断定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根据他的指示,中国外交部随即宣布:中方注意到了苏联领导人的讲话,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但强调中方重视苏联的实际行动。敏感的国际舆论意识到:中方“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sup>①</sup>。

当年8月,苏方接受了中方建议,同意就消除妨碍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问题进行磋商。同年12月,两国政府特使(副外长级)磋商在北京举行。但在磋商中,苏方否认并拒绝讨论中方提出的“三大障碍”,即苏方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驻扎重兵、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出兵阿富汗。此后双方磋商多年,始终没有重大突破。但两国都很珍视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坚持继续磋商,相互隔绝不相往来的僵局逐渐破除。

1982~1985年间,苏共三任总书记死于任上,中方三次派遣高级别特使出席葬礼,受到苏方欢迎。两国政治交往实际得以恢复。1983年,两国政府特使第二轮磋商期间,双方达成了互派留学生协议,两国贸易额当年亦大幅回升。1984年底,双方签署一系列科技、经贸合作协议,并决定成立中苏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两国关系正常化曙光在前<sup>②</sup>。

## 九 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为指导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1985年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苏方处理对华关系较前积极。

<sup>①</sup> 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sup>②</sup> 参见田增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294页。



在消除“三大障碍”方面，苏方的某些建设性立场和行动，受到中方欢迎。此后，双方在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的交往进一步扩大。1988年夏，双方决定结束政府特使磋商，直接准备关系正常化，最终决定1989年举行两国高级会晤。

1989年5月，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应邀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结束了双方30多年没有高层交往的局面，两党两国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邓小平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表示：两国领导人此次会见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重点放在开辟未来上<sup>①</sup>。会见中，邓小平特别谈到了他对当年中苏论战的看法。他说：“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对于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他指出，问题“不在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预言并建议：中苏“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双方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sup>②</sup>

中苏两国高峰会晤顺利结束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确认两国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强调中苏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重申双方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之间的一切争端。双方在公报中表示，要以目前的中苏边界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的中苏边界问题。两国在联合公报中还表示，双方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方面交流情况与经验，并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是有益的。

双方在公报中确认，两国共产党将根据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进行接触和交往。国际社会注意到，公报中有关两党关系的表述完全采用了中方观点。“中苏两国认为，在国际关系中应当摒弃任何国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和在任何地方谋求任何形式的霸权的企图和行动”，完全反映了中方立场和原则。由于双方在某些国际问题上仍有不同看法，公报表示“中苏两国认为有必要促进国际关系的根本健康化”。与此同时，一方面载明：“中方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另一方面也载明：“苏方主张在国际关系中确立政治新思维”。公报还特别强调：“每方对目前国际关系的认识体现在上述各自的主张和构想中。”<sup>③</sup>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页。

<sup>②</sup> 同上。

<sup>③</sup> 田增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308页。



这份联合公报不仅宣告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实现了完全正常化，同时也在国际上树立了相互尊重、捐弃前嫌、求同存异、共创未来的良好范例。这一年，双方友好交往全面展开，包括党际交流和军队交往在内，副部级以上代表团互访达100多起，其中约四分之一为正部级团组。双方的边境贸易和地方贸易总成交额达28亿瑞郎，超过了两国政府间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1990年4月，时隔26年后，中国总理又正式访苏。两国经贸额这一年达历史最好水平。

1991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应邀访苏。这是中苏关系正常化后双方的第二次高级会晤，也是1957年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访苏。双方对此高度重视，国际舆论亦格外关注。访问结束后，双方发表了第二份联合公报，一致表示“双方珍惜已经取得的成果，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睦邻、互利合作关系。”公报同时还表示：“各国都有权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经济模式和发展道路，这方面的差异不应妨碍各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和合作。”<sup>①</sup>这份公报之所以有这样一些特殊表述，是因为此时苏联改革已陷入困境，宪法规定的苏共领导地位已被取消，苏联内外政策开始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中苏双方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当年8月，苏联发生“8·19事件”，苏联共产党被取缔，社会主义制度被否定，联盟国家加速瓦解。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对待苏联发生的一切，如何处理新形势下的中苏关系，对依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构成严峻考验。中国通过外交渠道郑重表态：苏联发生的变化是苏联的内部事务。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中方相信，在中苏两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各项原则基础上，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将继续得到发展。

1991年12月，中苏关系正常化两年半之后，中国的最大邻国、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彻底瓦解了。波澜起伏的中苏关系，从此成为历史。

（责任编辑 张昊琦）

---

<sup>①</sup> 田增佩主编：《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第310页。